

中国实学思想史

中卷

葛荣晋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实学思想史

中 卷

葛荣晋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卷撰稿人(按章为序)

引	论	葛荣晋
第十九章		葛荣晋
第二十章		木日
第二十一章		马涛
第二十二章		张云勋
第二十三章		杨维益
第二十四章		俞力涛
第二十五章		魏宗禹
第二十六章		成复旺
第二十七章		成复旺
第二十八章		云帆
第二十九章		陈金陵
第三十章		魏宗禹
第三十一章		黄德昌
第三十二章		庶僮

第二編

明中叶至清中叶的实学思想

目 录

第二编 明中叶至清中叶的实学思想

引 论	(1)
第十九章 元气实体论哲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上)	(14)
第一节 明中叶朱学的衰颓与元气实体论的 兴起	(14)
第二节 晚明王学的衰颓与元气实体论的进 一步发展	(49)
第二十章 元气实体论哲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下)	(78)
第三节 晚明自然科学的复兴与元气实体论 的深化	(78)
第四节 清初实学思潮的高涨与元气实体论 的总结	(95)
第二十一章 《明经世文编》及其救世精神	(117)
第一节 “通今者之龟鉴,谋国者之兵卫”	(117)
第二节 “明治乱”,以清朝政	(126)
第三节 “重经济”,以充财用	(137)

第四节	“详军事”,以增强国防·····	(146)
第五节	“圣人不富国强兵,只是痴圣人、死 圣人”·····	(152)
第二十二章	明清的战争实践和兵学的发展 ·····	(156)
第一节	明清战争的特点与兵学研究的高涨 ·····	(156)
第二节	明朝中后期抗倭战争与兵学的发展 ·····	(164)
第三节	明清之际战争重点的转移与兵学的 进一步发展 ·····	(179)
第二十三章	明清实学与中医学的发展 ·····	(197)
第一节	实用精神与中药学的发展 ·····	(198)
第二节	瘟疫的广泛流行与传染病学的新突 破 ·····	(219)
第三节	实践精神与免疫学的产生 ·····	(232)
第四节	实证精神与《医林改错》 ·····	(236)
第二十四章	“西学东渐”与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 ·····	(241)
第一节	“西学”的传入与经世的需要 ·····	(241)
第二节	西方数学与“百家之用” ·····	(255)
第三节	西方天文历象之学与“修明历法” ···	(265)
第四节	西方地理学与绘制地图 ·····	(274)
第五节	西医学与医治疾病 ·····	(281)
第六节	西方火器与边防实战 ·····	(285)
第七节	物理学、水利学、冶金学、建筑学与 经世之学 ·····	(291)
第二十五章	市民阶层与启蒙经世思想 ·····	(298)

第一节	社会经济思想中的启蒙经世意识 …	(300)
第二节	社会政治思想中的启蒙经世意识 …	(312)
第三节	政治自由思想中的启蒙意识 ……	(322)
第二十六章	市民阶层与哲学启蒙思潮 ……	(333)
第一节	“学”的新生 ……	(334)
第二节	“心”的解放 ……	(346)
第三节	“道”的变革 ……	(362)
第二十七章	市民阶层与文艺启蒙思潮 ……	(384)
第一节	“情”对“理”的反抗 ……	(385)
第二节	性灵对格套的突破 ……	(398)
第三节	冲突对和谐的挑战 ……	(414)
第二十八章	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高涨与朱子学的 复兴 ……	(431)
第一节	晚明王学的衰颓与朱子学的复兴 …	(431)
第二节	清初实学思潮与朱子学的高涨 ……	(446)
第三节	“求之虚而难据,不若求之实而可循” ……………	(458)
第四节	“必有气质而后有性” ……	(465)
第五节	“即物穷理,原是实学”……………	(471)
第六节	“切于用世”的经世之学 ……	(478)
第二十九章	史学经世思想的兴起与发展 ……	(489)
第一节	晚明社会危机与经世史学的兴起 …	(490)
第二节	“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与史学经世 思想的发展 ……	(494)
第三节	“康乾盛世”与史学经世思想的进一 步发展 ……	(511)
第四节	浙东学派与清代史学经世思潮的高	

涨	(524)
第三十章 明清诸子学的复兴与发展	(537)
第一节 明清诸子学复兴的社会历史背景 ...	(538)
第二节 明清之际总结诸子学的实学思想 ...	(548)
第三节 “经子平列”的实学思想	(557)
第四节 具有理性思维的实学方法	(564)
第三十一章 考据实学的兴起与发展	(576)
第一节 考据实学的兴起及其理论先驱者 ...	(576)
第二节 晚明考据实学家的实学思想	(583)
第三节 明清之际考据实学思潮的进一步发 展	(609)
第三十二章 乾嘉学派与清代实学	(637)
第一节 乾嘉考据学的形成、派别及其学术 成就	(638)
第二节 “实事求是之学”	(644)
第三节 痛斥理学末流的“凿空附会之弊” ...	(653)
第四节 “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	(665)
第五节 “实测而知”的科学思想	(670)

引 论

从明中叶至清中叶,是中国实学思想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历史时期,随着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总危机的暴发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不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把中国实学的发展推向了高潮,成为明清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和社会进步思潮的主流。明清实学虽然是从宋元实学发展而来,但是它比宋元实学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在性质上亦有了重大的区别,是中国实学思想发展的最辉煌的时代。

在实体论学说上,宋代的张载、李觏、王安石和黄震等人,虽然都主张气实体论,但是他们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成熟的气实体论思想体系,在理论架构上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思想缺陷和自相矛盾。从明中叶开始,进步思想家立足于经世的要求,他们不但需要从哲学高度批判宋明理学,而且也需要为他们的“兴利除弊”的社会改革提供理论根据。他们在同程朱的理本论和陆王的心本论以及佛老的虚无论的辩论中,把中国元气(气)实体思想发展成为更加系统、更加成熟的哲学思想体系,是中国实学发展趋于高潮的重要标志之一。明中叶,随着程朱理学的衰颓,从程朱思想体系中分化出了以罗钦顺、王廷相、韩邦奇、吴廷翰、高拱等人代表的元气实体论思潮。晚明,随着王守仁的心学体系的瓦解,在“痛言王氏之弊”的过程中,王门后学纷纷

从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解脱出来,由心本体论转向了气实体论,注重实体,讲求实功,提倡经世。这一历史性转化,开启于黄绾、蒋信、王道,中经唐鹤征、杨东明,完成于刘宗周、黄宗羲。处于“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的实学家,在反思“明朝何以亡”中,或出于王学而修正王学,或由王学而回归朱子学再进而修正朱子学,从而全面地发展与总结了宋明的元气实体论思想,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清初著名哲学家王夫之。在明清之际元气实体论思潮的广泛影响下,甚至连当时朱子学的复兴也打上了实学的烙印,在理学思想体系中也容纳了更多的实学思想,从而补充和丰富了明清气实体论的社会内容。在明清之际自然科学的复兴过程中,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如李时珍、宋应星、方以智、揭暄等)为了推动科学的发展,总是把元气实体论哲学作为指导思想,并且在自己的科学实践中,又从天文、医学、农学、地学、物理学、声学等领域向前推动了元气实体论的发展,使元气实体论具有更加广泛的科学基础,把自然科学与元气实体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元气实体论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标志。

明清实学家在同宋明理学及其末流的辩论中,建立了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自成思想体系的元气实体论哲学。他们同宋明理学特别是理学末流的分歧,主要有四点:(一)在本体论上,他们既反对程朱学派的理本体论,也反对陆王的心本体论,更反对道家的“以无为本”和佛教的“以空为本”的思想。他们在吸收了程朱理学中的“理气相依”、“理在气中”的实理论思想,并且抛弃了“理为气本”、“心为气本”的空虚之论后,完成了从理本论或心本论向气本论的历史性转化。罗钦顺的“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王廷相的“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崔铤的“理者,气之条”,韩邦奇的“天地万物本同一气”,杨慎的“元气者,天地之极”,吴廷翰的气“为天地万物之祖”,高拱的“天地之间,惟一气

而已”，蒋信的“宇宙只是一气”，“凡言命、言道、言诚、言太极、言仁，皆是指气而言”，王道的“盈天地间，本一气而已矣”，唐鹤征的太极、阴阳、道、理“本一气而已矣”，杨东明的“盈天地间，只是一浑沦之气，生天生地，生人物万殊”，刘宗周的“盈天地间一气也”，“道理皆从形气而立”，黄宗羲的“气本一也”，“无气外之理”，李时珍的宇宙变化“皆由于一气”，宋应星的“形气水火之道”，方以智的“人与天地万物同是一气”，顾炎武的“盈天地之间气也”，傅山的“气在理先”，颜元的“理气融为一片”，李贽的“非气外别有道理也”，王夫之的“言心言性言无言理，俱必在气上说”，等等——所有这一切说法，都是明清元气(气)实体论哲学的不同表述方法。他们还以气本论思想为武器，合理地解释了太极与阴阳、一与两、理与气、有与无、理与道、道与器、聚与散、神、上帝、太虚，形而上与形而下、动与静、虚与实、诚等一系列哲学范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气本论思想体系。王夫之的“道依于气”与“阴阳以道为体”、“无其器则无其道”与“无其道则无其器”的命题，更是充满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二)从气本论出发，在人性论上，他们针对程朱派的性二元论，吸取了其中的实性论，抛弃了以理释性的思想，根本不承认宋儒的天地之性(天命之性、义理之性)的存在，只承认人性就是“气质之性”。王廷相的“性出于气”，吴廷翰的“性气一物”，高拱的“人只是一个性，此言气质之性”，蒋信的性“同出于一个太极”，王道的“气为之性”，唐鹤征的“性不过是此气之极有条理处”，杨东明的“义理之性出于气质”，刘宗周的“离气质无所谓性”，黄宗羲的“气质即性”，方以智的“性之质为气”，颜元的“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等等——这些说法，也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性气一贯之道”，是气本体论思想在人性论上的进一步贯彻。(三)在天理与人欲(道心与人心、义与理)问题上，明清实学家基于对气质之

性的肯定,都坚持理欲(义利)统一说,反对“存理灭欲”的理学主旨。罗钦顺的“性必有欲”,韩邦奇的“人之生,欲与善,气与理同受”,杨慎的“性情不离”,吴廷翰的“天理必有人欲”,高拱的“理欲不两立,人心无二用”,黄绾的“道心在人心”,“义利皆不可轻”,唐鹤征的“舍五脏之外,安得有心(道心)?”刘宗周的“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离却人心则无道心”,“人性即天理”,黄宗羲的“道心即人心之本心”,等等——这些说法,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充分肯定人的情欲的合理性,提倡在利中求义、在欲中求理、在人心求道心。认为离开利欲而求义理,只能是空义与空理,极力反对理学末流“罕言功利”的空疏不实之风,从而为他们的经世思想提供哲学依据。(四)在道德修养上,明清实学家吸取了宋明理学中的“实功”与“实践”思想,极力批评理学末流的离开实功、实践而提倡的主静、空悟之谈,坚持实功论和实践论。王廷相主张“内外交养,德性乃成”,提倡在“人事著实处养之”;韩邦奇反对“终日静坐”之法,强调在“世事”中养性;黄绾提倡“在实言、实行上做工夫”;唐鹤征提出“悟前悟后,凡有实功,皆实际也”;刘宗周提出“本体只在日用常行之中”——所有这些命题,都是针对理学末流而发的,具有明显的实学性质。宋元实学家多注重于功利思想和具体的社会改革举措,而对于作为经世思想的哲学基础——元气实体论则探讨不够,缺乏严密的系统的理论指导思想,难以从哲学高度战胜理本体论与心本体论。明清时期的实学家所建构的元气实体论思想体系,则为明清实学思潮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们在元气实体论、心性合一论、理欲统一说和实功论、实践论等思想的指导下,开创了一个面向社会实践、注重功利、强调经世的新学风,从而把明清实学思潮推向了高潮,真正做到了“实体”与“达用”的有机结合,成为中国实学思想的最完备的最成熟的理论形态。

在“达用”思想上,明清实学家针对明清社会的积弊,不但多方面地揭露与批判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和统治者的昏庸无道,而且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旨在社会改革的各种方案。由明末陈子龙主编的《皇明经世文编》一书,集中地反映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世思想。为了挽救明朝的社会危机,有明一代的实学家如罗钦顺、王廷相、吕坤、高拱、张居正等人,不但在田制、水利、漕运、荒政、赋税、兵制、边防、吏治、科举等方面揭露了当时的各种弊端,而且提出了各种救弊方案。清初的实学家如顾炎武、颜元、王源等人,亦都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的“明道救世”思想。甚至在乾嘉时期,考据实学家亦在治经考史的形式下表露自己的经世意识。特别值得指出的,由于明清战争频繁,促使中国兵学的空前发展,成为明清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救国济世的经世主义,一直是明清实学思想的主流,这与当时理学末流的“只管讲学,不顾现实”的末世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政治上的经国济世之外,明清时期的达用之学还包括有科学精神的高扬。宋元时期,在张载、二程和朱熹的思想体系中虽有某些科学思想,但是由于后来理学末流空谈性命,不务实学,遂使明代自然科学陷于冷落、沉寂。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实学思潮的高涨,明中叶后,自然科学开始由沉寂转向复兴,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和划时代的科学著作,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弘祖(或宏祖)的《徐霞客游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王锡阐的《晓庵新法》,梅文鼎的天算之学,刘献廷的舆地之学,以及乾嘉学者对中国古典科学的考证与整理等。这一科学复兴思潮,从性质上,既包括对中国古典科学的总结,又包括对从欧洲输入的“西学”的吸取与改造;从研究领域,既包括天文、历法、数学、音律,又包括地理、农业、水利、生物、采矿、建筑、机械、医学等多种学科。这是明清实学思

潮兴起和社会生产发展需要的产物。如明清中药学的发展是以实用精神为原动力的,对传染病学的新突破是以社会实践需要为基础的,免疫学的产生也离不开实践精神的指导,人体生理解剖学的发展也是实证精神的充分体现。“西学东渐”既适应了明清之际经世的社会需要,又极大地丰富了明清之际经世实学的社会内容,如“西方数学与百家之用”、“西方天文历象之学与明清修明历法”、“西方地理学与明清绘制地图”、“西医西药学与医治疾病”、“西方火器与边防实践”、“物理学、逻辑学、水利学、冶金学与经世之学”等,从一个重要侧面揭示了“西学东渐”与经世实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明清实学思潮的广泛影响下,许多进步学者摆脱了儒家的“重伦理、轻技艺”的传统,把注意力放到了自然科学的探索上,不但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科学思想,而且也开创了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的时代新风,并且把近代西方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也引进了科学研究领域,这些都是宋元科学思想所不能比拟的。

除了政治上的经世思想和探索自然奥秘外,在学术上还表现为“通经致用论”和“史学经世”说。随着实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在经学研究上,出现了与“宋学”相对立的“汉学”,其中包括考据实学思潮和诸子学的复兴。主要代表人物有杨慎、焦竑、陈第、方以智、顾炎武、傅山、毛奇龄、闫若璩、胡渭、惠栋、戴震、汪中、焦循、阮元等人。在经学研究领域,实学家针对理学末流的“凿空附会之弊”,发挥宋代王应麟等人的精于经史考据的传统,坚持“实事求是之学”。杨慎反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坚持博物与实证相结合的考证方法;焦竑注重经书的真伪考辨;陈第创造性提出了“本证”与“旁证”相结合的考据方法,提倡“读经不读传注”、“以己意论断经书”的治学方法。晚明考据学家都十分注重实地考察取证的方法,注重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二重

证据”方法,充分反映了他们的求实思想。明清之际的考据学家,在晚明“经道合一”思想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经学即理学”、“明经致用”的治经宗旨,大力提倡怀疑精神和实证精神,坚持“注经必籍实据”的方法,大兴古籍辨伪之风,公开否定宋学的经学基础。乾嘉时期,他们针对理学末流的空疏之风和八股时文的弊病,大力提倡“治经必先通言古训”的方法,“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他们“谈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在考据实学的兴起与发展中,先秦诸子学也随之复兴,并且在批判独尊儒经的过程中,提出了“经子平列”的实学思想,从而为明清经世实学提供了更加广泛的根据。在史学研究上,中国素有以史为鉴的传统。明清实学家继承与发展了宋代深宁学派的“史学经世”和元代刘因、郝经等人的“古无经史之分”的思想,掀起了史学经世的社会思潮。晚明的社会危机唤醒了进步学者的史学经世意识,出现了一批志在经世的史学著作,如陈建的《皇明启运录》,高岱的《皇明鸿猷录》,雷礼的《皇明大政纪》,薛应旂的《宪章录》等。随着明清王朝的更替,顾炎武提出了“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王夫之提出了“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黄宗羲提出了“儒者之学,经纬天地”;王鸣盛撰写《十七史商榷》旨在“启导后人”;钱大昕主张“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赵翼撰写《廿二史劄记》,是为了探索“有关治史兴衰之故”;洪亮吉治史的宗旨是“学古为人官之本,前事即后人之师”——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史学经世”思想的不同方式的表述。由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学派是以治史为特征的。万斯同提出的“经世之学,实儒者之要务”,全祖望提出的“史以纪实,非其实者非史也”,章学诚提出的“史学所以经世”和“六经皆史”说,都是对明清时期史学经世思想的理论概括和总结,为中国史学经世的优良传统增添了光彩,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明清实学思潮,既包括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进步思想,也包括有反映市民阶层利益和愿望的启蒙意识。市民启蒙意识的觉醒是宋元实学所不具有的,这只是明清时期所特有的意识形态。明清市民启蒙意识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艮、何心隐、李贽、黄宗羲、傅山、王源、徐渭、汤显祖、袁宏道等人。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启蒙意识,既表现于社会政治领域,也表现于哲学与文学艺术领域。(一)在社会经济领域,黄宗羲、唐甄、王源等人反对“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在南宋陈亮、叶适“农商一事”的思想基础上,大力提倡“工商皆本”思想,主张统一货币,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和市民地位提高这一客观事实的反映。在土地制度上,他们已突破了封建士大夫的“均田”、“限田”之说,公开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王源提出的“惟农为有田”的主张,开启了中国近代“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先河;他们针对传统的“重义轻利”和鄙视财富的思想,大力提倡“富民”政策。傅山的“本以富生人”,唐甄的“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等命题,都是市民的求富心理的反映。(二)在政治思想领域,他们以民本主义为武器,公开怀疑、限制和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甚至提出君臣共治天下的主张,开启了中国近代民主启蒙意识的序幕。何心隐提出的“君者均也,君者群也”的命题,蕴含有平均主义的乌托邦色彩。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著名论断,提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并且企图通过“置相”和“学校”来实现他的“有治法而没有治人”的政治理想。唐甄继黄宗羲之后,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帝之大神也,皆人也”,认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顾炎武主张“寓封建于郡县之中”,提倡“众治”,反对“独治”,以限制专制主义的君权。在傅山看来,最高统治者“尽独夫”、“若草芥、寇仇,则后世之大人矣,小人焉能爱之?”提出“非圣人能王”的主张,公开主张“市井贱夫治天下”。王源在《平书》中提出了新六部之说,主

张增设货部,反映他对商品经济的高度重视。(三)在文学艺术领域,随着明中叶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出现了一股具有近代意义的文艺启蒙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徐渭、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人。这一文艺启蒙思潮,实际上就是要把文艺从中世纪的古典主义中解放出来。在文艺内容上,针对传统文艺的“以理节情”之说,提出“发于情性,出于自然”之说,反对“理”对“情”的束缚;在文艺形式上,针对传统文艺注重“法”,循守古典格套,维护“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的文艺本色,以便“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宁今宁俗”、“我自为我”的口号,追求创作自由;在审美风格上,针对传统文艺强调和谐之美,追求发愤、激情的冲突之美。(四)在哲学领域,也出现了一股哲学启蒙思潮,即要求把人从中世纪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的社会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王艮、何心隐、李贽、焦竑等人。他们极力发掘和弘扬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社会价值,提倡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他们蔑视封建偶像崇拜,否定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公开宣布要“与千百万人作对敌”,“颠倒千万世之是非”,从哲学上论证了“人之是非,初无定质”的思想,崇拜“百姓日用之迹言”。他们针对传统哲学把心说或是伦理道德实体的做法,李贽提出了“夫私者,人之心也”的命题,把“心”说成是维持人的生命存在的谋生意识,从理论上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他们还针对宋明哲学的“存理灭欲”之说,力主理欲统一说,揭露“以理杀人”的本质,宣扬具有近代意义的自然人性论。王艮提倡的尊身之道和“明哲保身”论,实际上也是对人的生存权力和物质利益的充分肯定。何心隐的“士农工商莫非在,莫非心”、“士农工商莫非率,莫非性”,也是从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出发来寻求“心”与“性”的社会内容。李贽提出的“人即道也,道即人也”和“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思想,也是针对封建主义的